本版编辑：史小今
E-mail：m2@studytimes.cn
Tel：010—62804757

专家视点

文明冲突是否成真？

□ 刘建飞

自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以来，文明冲突就成了国际政治中的一个热词，时常出现在媒体和学者们的论著中。赞成者有之，批判者也不少。但是有一个规律，只要一出现伊斯兰力量同西方力量的冲突时，或是恐怖袭击，或是国家间外交纠纷，赞成文明冲突论的声调就高起来。近来，随着一系列针对欧洲国家的恐怖袭击、土耳其政变及其带来的土美外交纷争等事件的发生，有人疾呼，亨廷顿的“文明冲突”预言已成真。果真如此吗？

“文明冲突论”的要义是，在基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对抗的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斗争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将明显下降，与之相应，由文明差异所带来的冲突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会凸显出来，尤其是西方文明同伊斯兰文明和儒教文明之间的冲突将占据突出位置，甚至会决定国际政治的走向。笔者以为，亨氏注意到文明之间的关系问题，确实是他的高明之处，冷战结束20多年来，似乎可与文明冲突挂上钩的事件能够找出许多，特别是“9·11”事件以及后来的反恐战争，看上去就是一场伊斯兰世界同西方世界之间的不对称战争。如果比较一下文明冲突与意识形态冲突，谁对当今国际政治的影响更大，恐怕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文明冲突。

然而，如果对所谓文明冲突的事件做更具体的分析，就会发现问题：无论是反恐战争还是针对西方国家的恐怖袭击事件，与西方对立的并不是整个伊斯兰世界，而只是其一小部分，是伊斯兰中的极端势力。“9·11”事件也遭到多数伊斯兰国家的谴责，相当多伊斯兰国家也都帮助西方打反恐战争并且直到目前还同西方国家保持良好关系。按照亨廷顿的定义，同西方冲突的伊斯兰极端势力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一种文明。所以，亨廷顿所预言的伊斯兰文明同以基督教为基础的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并未成真。至于他所预言的西方文明同儒教文明之间的冲突就更是连影子都找不到。

如此说来，文明冲突论就没有意义了吗？非也！文明冲突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就在于，国际社会要重视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从哲学上讲，差异就是矛盾，有矛盾就有对抗性因素。在国家内部，会有阶级矛盾、种族矛盾、党派矛盾等等，国家之间则存在着民族矛盾和国家利益分歧。各种矛盾相互作用，有时相互促进，有时又相互制约。到底孰重孰轻，需要根据具体情势而定。冷战时期，美苏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尖锐对抗就压抑了许多文明、宗教、民族之间的矛盾，使它们处于从属地位。而冷战结束后，这些矛盾都浮上水面。

对文明冲突问题，我们需要把握的是文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到底占据什么地位，扮演什么角色。文明因素说到底是精神层面的因素，同意识形态、价值观等一样，是国家利益的重要方面，也是重要软实力。但是同国家安全、发展这些物质层面的利益以及与之相关的硬实力相比，通常居次要位置。当前者面临威胁的时候，后者肯定让位于前者。但是，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不可忽视。意识形态与文明等精神因素通常与物质层面尤其是安全利益交织在一起，并直接影响国家决策者对本国核心利益的判定。当年苏联高举反帝旗帜，被西方认定为敌人，又因苏联强大而被认定是最具威胁性的敌人。苏联改旗易帜后，西方就不再将它视为敌人，尽管它仍然很强大。非我族类，如果贫弱，其心虽异，但不足惧；同我族类，如果强大，虽然也是威胁，但不是致命的。在现实中，“族类”可以是民族、国家，也可以是宗教、文明，还可以是阶级、党派、政治集团、种族、部族，甚至还可以是宗族、家族。只要是有不同的身份认同，就会产生不同的“族类”。无论哪种“族类”，其间的斗争、冲突、战争都可以同样惨烈。

认识文明问题，还需要重视的是，文明差异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主要不在于其外在表现，如生活习惯、大众文化，而是在于其内涵着的价值观。所以，破解文明冲突的根本之道是构建人类共同价值观，用人类这个“大族类”统合各种各样的“小族类”。

中国更深度参与全球治理

□ 马小军

G20杭州峰会是全方位检验中国主场外交的重要舞台，也是中国展现全球领导力的重要机会。当前，世界经济复杂多变。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本次峰会，期待峰会能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应对风险和挑战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国也为峰会提供丰厚的“中国方案”、中国议程，涉及经济发展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方方面面，发挥中国在20国集团中的政治引领作用和领导力，为与会各国和整个国际社会所期待。

不规避政治议题，积极发挥领导力

全球治理的实质，是大国及主要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合作，向国际社会提供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国际公共产品。在全球治理中，大国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决定着其国际地位与话语权。近来，美国大选的政治丑陋化倾向，英国脱欧带来的欧洲政治的不确定性，表明美国和西方体制内部出现了大的问题，弊病凸显，极大影响其全球领导力，在解决全球问题上的执行力也被大大削弱。作为此前公共产品主要提供者的美国与西方国家趋向衰落，其继续提供国际公共品的意愿和能力显著下降。美国和欧洲减少公共产品供应之际，正是中国和平崛起增加公共产品供应之时。这一减一增标志着权力结构的变化，显现出领导力的增减。这就给中国带来一个展现全球领导力的历史契机。

当前，正值国际社会对公共产品需求高涨之际，却出现严重供给不足的局面，亟须进行供给侧改革。

当今世界，中东乱局、欧洲难民潮、朝鲜核危机如此等等，无一不体现地缘政治的崛起，世界充满不安全感。这就带给杭州G20峰会一个无法绕开的大话题：如何避免已经或正在获得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成果，以及此次20国齐聚杭州所要着力解决的经济发展问题，不被大国间政治纠纷所折损，或地缘政治、地区冲突、恐怖主义所对冲和销蚀？

毫无异议，杭州峰会的主题是经济发展。作为G20峰会主席国的中国，从技术层面着眼，应当多做工作，尽量避免或绕开敏感外交问题，不让峰会被南海领土争端、韩国部署“萨德”等“会外问题”搅扰。然而，在上述形势下，若仅仅是小心规避世界地缘政治纷争话题，似乎既无法消除政治上的被动局面，在会议组织的技术操作层面也易陷于进退维谷之境。既然如此，中国不如利用东道主的特殊地位，在扩大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议题上、制定国际经济规则中的话语权的同时，努力增加在国际政治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在国际政治层面——诸如金融安全、网络安全、外太空安全等领域，提出全球治理新的议题和议程。中国自身也需要理解、包容和接受新的规则。中国不仅已具备接受新规则的能力，也已具备了深度参与制定新规则的能力，更具备了率先执行新规则的领导力。新的规则也将成为推动中国自身改革的新动力。

中国应理直气壮地向国际社会大声倡议，将G20峰会发展成为全球治理的主导机制，倡导构建大国间面向21世纪的大国关系准则，提出构建大国间处理矛盾、管控危机的基本原则，提出在双边及地区冲突中的危机管控规则与机制的“中国方案”。在涉及中东问题、欧洲难民、海洋安全与共治、地区冲突等一些重大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上的中国立场，同时不失时机地结合宣传中国经验。

例如，应着力宣传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宣传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共同体的愿景，这是中国对全球治理基本价值观做出的重要思想贡献。中国应呼吁大国和主要国家，通过各自构建和睦共享的周边共同体，营造和维护世界的大的和平发展环境。

例如，中国应在峰会期间提出倡议：大国间磋商协调出一套有效的规则和机制，避免全球经济治理所取得的成果，被四处频发的地区冲突、反恐战争、传统领土主权争议、地缘政治危机所对冲，甚至吞噬，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更多欠发达国家，让世界分享这些成果，提供制止或抑制这些冲突和危机的正能量。

全球化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是世界现行自由贸易体制的维持者和改进者。在某种意义上，“自由贸易”已成为中国的软实力。如果中国能在峰会的重大国际多边场合，不仅积极介绍中国创新发展和结构改革的目标和成绩，向世界传递强有力的信息——中国仍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是推动世界经济开放的重要力量，而且能够在中国的倡导及与会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在反对民粹/民族主义和地缘政治过热，促进世界自由贸易和继续推进全球化方面取得共识，那么，峰会的里程碑意义将进一步凸显，中国在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和繁荣过程中的政治领导作用也将得以确认。

中国应积极推动G20自身的机制改革

当前，世界秩序正在发生历史性转型。现行国际体系不平等、不公正性凸显，全球治理体制弊端丛生，限制了国际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面临重大改革。全球治理改革的大趋势，催生了G20这个首要平台。2008年以来国际关系的现实表明，世界需要G20。在全球治理方面，正在由以往的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东西方共治的最重要特征就是中国和平崛起。中国通过G20平台，对现有治理机制的改革和创新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有效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更多优质国际公共产品。同时，中国也在积极推进G20自身的机制改革。

目前，G20机制存在执行力、协调力、领导力三方面的缺陷。根本原因在于：其一，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经济日益相互依存，同时全球经济治理却存在治理赤字和治理碎片化的严重缺陷；其二，由于西方国家长期把持国际话语权、决策权，占据治理的议题设置、规则制定的优势，全球治理权力结构严重失衡；其三，随着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诸多经济发展及政治负面效应的累积，不仅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包括一些发达国家中，反全球化思潮、民粹主义政治运动上升。加之，美国大选、英国退欧、欧盟遭受的一系列经济、反恐危机，不仅正在改变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生态，而且助长了当前的反全球化思潮，从而冲击到世界秩序的转型。此外，大国合作意识减弱，大国竞争意识加强，致使地缘政治矛盾深化。

G20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和东西方共同治理的新的国际模式。它不应仅是一个危机应急管理机制，而应随着世界秩序的大调整而转型成为一个常态化的全球治理机制。中国在推动这一转型进程中，无疑应发挥积极的领导作用。全球治理的基础是大国共识与合作，更是G20机制改革的基础。中国应倡导G20国家间的政治合作，打造合作平台，创新机制建设，推动G20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从而为经济增长与繁荣、全球经济治理，开创新愿景，提供新动力。由于G20只是一个政府间的对话机制，不具有执行力和法律约束力，其形成的政策文件只能倡议各国执行，至于落实程度则因各成员而异。同时，不少成员国，包括许多西方发达经济体，常常以国内政治为由，不愿或无力执行G20峰会达成的共识。中国可适时提出G20机制常设化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应体现对上述全球治理权力结构失衡的改革，机构设置透明、专业、公平，奉行廉洁，追求效率。未来，G20应更多采用第三方监督与评估的方式，邀请专家或国际组织就某问题的执行情况为各国评分，借此敦促各方落实承诺。



用“金砖合作”机制做好G20峰会大文章

□ 丁 工

中国作为G20杭州峰会主办方，应从战略高度看待和处理BRICS和G20两大机制，在坚守发展中国家立场底线的基础上，促进金砖合作与二十国集团机制发展战略对接和重点领域合作。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作用不可忽视

作为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新生力量，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已经开始逐步显现出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不可忽视的作用。从2009年到2016年的7年时间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已经演变成覆盖亚、欧、非、美四大洲的新兴经济体合作渠道和“南南”对话平台。就金砖组织的运作模式来说，该合作机制已经形成了领导人会议、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部长会晤、常驻多边机构使节磋商的全方位、多层级的立体合作网络。同时，除官方会晤与合作机制以外，金砖国家相关部门和团体还开展了企业家论坛、银行联合体、合作社论坛、智库会议、金融论坛和工商论坛等多种配套活动。尽管金砖国家已经具备了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基本条件，并逐步形成一些共同的利益诉求和现实的合作举措。但也不得不承认在稳定大宗商品价格、阻止金融监管失效、建立合理汇率机制、打破投资贸易壁垒、促进国际贸易平衡等诸多方面，金砖国家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常常以“边缘化”“被治理”的面貌出现。

G20是由G7选定的国家组成的俱乐部，主要目的是想将新兴大国纳入发达国家主导的规则和框架之内，使中国等新兴国家帮助西方国家分担全球治理的责任。故而，在金融危机面前美国高度重视G20平台，希望其发挥动员全球资源促进经济实现全面彻底复苏目标的作用，但危机过后美国开始采取“对外转嫁”风险的政策，对借助G20推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态度趋向意兴阑珊。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是现行秩序的既成者，必然要想尽各种办法、动用各类资源延缓和迟滞权力转移的进程，这种沉湎旧习、拒斥新规的消极态度导致G20改革进程疲态尽显。同时，尽管当前全球战略格局展现东起西落、南升北降的整体态势，但发达国家正在止跌回升，发展中国家也现冲高回落苗头。在发达国家对G20治理需求与合作基础减弱的背景下，金砖国家作为体系中实力不断上升的新起后发势力，也是具备势能和容量成为世界体系核心的大国团组，应当遵循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的原则集体发声发力，推动并促成G20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从周期性政策向结构性政策改革转型，以及从解决短期性问题为主向追求激发长期增长潜力和增强内生增长动力转变，以便为G20机制发展注入活力、增添动力，从而对国际经济治理发挥更大作用提供助益帮衬。

总体来看，当前美日推动西方国家加强整合协调，针对中、俄一面日益凸显，如2016年5月刚召开的G7峰会上，部分西方国家提出应首先避免新兴经济体的竞争性贬值，协调全球的汇率政策，与中方将创新增长和结构性改革作为此次G20峰会重点议题的主张有所差别，日本更是企图在G20峰会加入“产能过剩的压缩”、TPP协议内的数据自由流动等内容，以G7峰会对冲折损G20峰会的拆台心态明显。在南海问题上，呈现美国在后台撑腰鼓气、日本在前台冲锋出招的状况，并试图将该议题引入G20杭州峰会。因此，中国注重强化金砖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和经济合作，夯实与部分国家周旋的根基。

全球治理的生力军

发展中国家是全球治理的生力军，新兴大国是全球治理的排头兵。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维护和拓展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既是中国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础要素和政治资本。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始终致力于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力争为发展中国家赢取更大的国际规则制定权。因此，中方在拟议本次G20参会成员名单时，除依循惯例邀请G20各个成员方、嘉宾国以及相关国际组织和地区机构的代表参加峰会外，还特意邀请哈萨克斯坦、埃及两个极具代表性的发展中大国一同出席杭州峰会，并且中国还努力协调、促成77国集团年度轮值主席国泰国如期参会的事宜，从而为帮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治理核心进程中搭建媒介、架设桥梁。另外，中国在G20杭州峰会议题设计方面，倡导通过用足用实G20平台来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坚定支持将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作为G20峰会的主要任务和工作方向之一。

金砖国家合作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合作治理的典型案例，也是推进南南合作的一个重要载体。金砖组织尽管积极强化发展中国家利益代言人和维护者的角色，努力提升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但金砖国家组织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仍然是同发展中国家的横向交流和实质合作偏少。虽然每年金砖轮值主席国都会邀请区域国家代表和观察员参与金砖峰会，但此种模式由于缺乏持续性尚未形成固态化的惯例通则，因而无法体现其他南方国家的治理诉求。因此，建议金砖组织可以考虑在G20峰会期间推动召开“金砖国家+N”联席会议，届时邀请有意加入金砖组织或有意向与金砖机制开展合作的国家。以金砖组织为主宾国，相关区域组织或部分发展中国家为对话方，建立一个同心圆交流机制，首期可以从外长和智库层面的官学交流开始，以后视需要建立经济、安全等其他领域的定期高官对话机制。通过此种方式不仅能够将全球主要的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域性多边组织协调起来，而且也为广大南方国家提供了一个会商合作、共谋发展和交流发声的渠道媒介，这对于增强金砖国家合作的合法性将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因此，借助本次峰会东道主之便，中国以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全面参与全球治理为问题导向、以G20机制为活动载体、以金砖组织为项目平台，积极引领世界发展的时代潮流，努力为人类社会的福祉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相信本次峰会必将能够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一个里程碑式的新航标。